

独立与自由

陈寅恪论学

王震邦
著

獨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獨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独立与自由

陈寅恪论学

王震邦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独立与自由:陈寅恪论学/王震邦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ISBN 978 - 7 - 208 - 09988 - 3

I. ①独… II. ①王… III. ①陈寅恪(1890 ~ 1969)—
学术思想—研究 IV. ①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93479 号

责任编辑 毛志辉

封面设计 王小阳

独立与自由

——陈寅恪论学

王震邦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 × 965 1/16 印张 15.75 插页 4 字数 210,000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100

ISBN 978 - 7 - 208 - 09988 - 3/K · 1773

定价 30.00 元

出版说明

近十几年来,两岸学术文化交流日益密切。本社向以传播学术文化为己任,为将优秀的学术成果转化为高质量的出版物而努力,在出版港台地区的优秀学术文化作品方面亦不遗余力,竭力为广大读者奉献优质的精神食粮。

王震邦教授关于陈寅恪先生学术思想和成就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代表当前港台地区研究的前沿。本社决定推出王震邦教授的作品,并保持其研究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其中所涉的一些概念、观点,或与大陆主流学术界略有偏颇,留待读者权衡取舍。

学术为天下公器,立言可达人生不朽。我们殷切期待海内外学者不吝赐稿,为学术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共同做好这件有意义的事情。

序

19 世纪以前,中国史学领先西方史学,为彰明较著之事实。中国自远古时代起,设立及时记载天下事之史官,数千年不绝,世界万国,无此制度;中国史官记事,至魏晋以后,兼及修史,浩瀚史料,编纂成籍,中国翔实之正史,遂破世界史学之纪录;中国史学,特色为精细、详赡、博大,与西方史学比较之后,益见凸显;人类之文明史,亦待中国史学理论之发挥而创写。凡此,皆中国史学之世界价值,极值珍视。

19 世纪以后,西方史学进入黄金时期(the golden age of historiography)。历史所涉及之范围,已扩展至社会、经济、心理与文化。史学家已不再只写王朝、战争、条约与宗教。出色之大史学家如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麦考莱(Lord Macaulay, 1800—1859)、米其勒(Jules Michelet, 1798—1874)、柏克曼(Francis Parkman, 1823—1893)、孟荪(Theodor von Mommsen, 1817—1903)等,不再是记录者(chroniclers)、编年者(genealogists)与说故事者(story-tellers)。所写成之新史,触及人类经验之多样性与复杂性。环顾寰宇,未有类此崭新之历史。加以竞新斗奇之史学方法,亦于此时出现。尼博儿(Barthold Georg Niebuhr, 1776—1831)、兰克所创以语言文字批评史料之方法,掀起史学革命,量化方法、心理分析方法以及社会科学方法,随之群出并作,如飙风骤起,西方史学,于是风

靡天下，举世史学，皆俯首于其下，未有能与相颉颃者。

19世纪以后，西方史学极盛，中国史学则趋于衰微，博洽精醇之历史巨著不再现。寢假至西方史学东来，攻击与贬抑中国史学之声浪四起。两千余年之中国史学，于是遭遇空前未有之大变局。史学存亡，决于旦夕，有识之士，如梁启超、张荫麟、陈寅恪之议论，遂为中国新史学之指南，有待发挥而评论焉。

梁启超为晚清言论界之骄子，学术界与政治界最活跃之人物。深爱中国史学，亦猛烈攻击中国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为其对中国史学之无情攻击。所著《中国历史研究法》，辗转接受德、法班汉穆(Ernest Bernheim, 1854—1937)、朗格诺瓦(Charles V. Langlois, 1863—1929)与瑟诺博司(Charles Seignobos, 1854—1942)之史学方法，而以优美明快之文笔畅述。谓史料为“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分史料为“直接的史料与间接的史料”，“文字的史料”与“在文字记录以外”之史料；论及史迹之论次，画出“史迹集团”，以为研究范围。此皆石破天惊之史学见解，梁氏果能如此自创耶？稽之班汉穆、朗格诺瓦与瑟诺博司三氏之说，梁氏之新说，泰半非出之于个人。惟梁氏以宽阔之胸襟，于所热爱之中国史学之外，广纳异趣之西方史学，此为大史家之风范，亦输入西方史学之第一功臣也。

张荫麟幼承父教，熟读经史古文辞。1929年以公费赴美留学，攻读哲学与社会学。回国后任教清华大学，专治史学，着手撰写《中国史纲》一书。以哲学与社会学为基础，以写中国五千年历史者，张氏似为第一人。彼于《中国史纲·初版自序》提出其所悬鹄的云：

(1) 融会前人研究结果和作者玩索所得，以说故事的

方式出之,不参入考证,不引用或采用前人叙述的成文,即原始文献的载录,亦力求节省;

(2) 选择少数的节目为主题,给每一所选的节目以相当透彻的叙述,这些节目以外的大事,概略地涉及以为背景;

(3) 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贡献,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兼容并详。

自此可见张氏史学之精湛,及其所受西方史学写史方式之影响。以致其书最为近人所盛赞者,为其融化原始史料,以近代新文体写出,而优美委婉。此为新中国通史成功之条件之一。惜张氏多病,英年早逝,其书仅写至东汉初年,令人扼腕!

以《中国史纲》与其所引用之原文相比较,其新写者,文字与意境皆不能企及于原文。此为此类新史之致命创伤。英年史学家之成就,古今中外,皆有限制,此为莫可如何者也。

陈寅恪出身名门,家学渊源,国学基础深厚。1909年至1925年十余年间,游学欧美,厕身美国哈佛大学、法国巴黎大学与德国柏林大学,研究不辍。其研究以语言文字为重点,借以研究历史。据云彼能运用十余种以上之外国语言文字,此为前无古人者。如此治史,显系受当时德国极为盛行之兰克语文考证学派(即为以语言文字批评史料之学派)之影响。陈氏归国后,讲学清华大学,将所吸收之西方史学,与中国乾嘉时代之历史考证学相融合,于是其新史学出。所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为代表性之作品。其论及政治制度与社会习俗,明显受西方之影响。然不露模仿痕迹,自然呈现,此为真能贯通中西史学者。“寅恪生平好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盖为陈氏真切之自述。兼重中学与西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陈氏治学之基本态度

如此。

陈氏中年以后，双目失明，仍继续著述。又身处惊涛骇浪之中，而卓然独立，不失操守。较之冯友兰之辈，宁能同日而语耶？

维运治史半世纪以上，醉心比较中西史学而思求会通之道。于梁启超、张荫麟之史学，皆作论述，独于陈寅恪之史学，未着笔墨，遗憾孰大焉。今王震邦教授写成《独立与自由——陈寅恪论学》一书，得窥陈氏一生之全貌，万里外闻之，欢欣鼓舞。揭出陈氏所强调之学术独立与自由思想，尤为其书之最大特色。震邦教授胸襟开朗，思想纵横，又长期出任类似史官之工作，牛马走天下，时代心声，得其传达，故乐为之序。

2011年3月

杜维运序于温哥华

目 次

序 杜维运/1

第一章 绪论/1

第二章 思想认同及渊源/30

第一节 史家的童年和思想发展/30

第二节 游学——兰克史学或东方语言学/51

第三节 从西方汉学转向中国史学/62

第四节 小结/70

第三章 古典辩证法和“假设”的提出/71

第一节 陈寅恪“假设”和“辩证”渊源——与胡适的“假设”对照/73

第二节 陈寅恪“假设”与“辩证”的中古史实践/83

第三节 陈寅恪的“假设”与“辩证”的“颂红妆”实践/97

第四节 小结/109

第四章 失焦的辩论：对对子和文法/116

第一节 对对子成为话题/119

第二节 对对子和汉语文法研究方向/123

第三节 没有对话的辩论/127

第四节 没有真正的对话/134

第五节 《马氏文通》与走向格义式的中国文法/139

第六节 “孙行者”和“三白”考题及胡适与义宁父子/150

第七节 小结/155

第五章 “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159

第一节 “体用论”及“中体西用”溯源/162

第二节 陈寅恪与“体用论”/167

第三节 《论韩愈》和“天竺为体”/173

第四节 “体用论”与文化本位/179

第五节 从《辟韩》至《论韩愈》/183

第六节 《论韩愈》的现实背景/187

第七节 “体用论”的实践矛盾——以中医为例/193

第八节 小结/195

第六章 余论/201

征引书目/207

附录 陈寅恪“不古不今之学”新探/221

第一章 绪 论

陈 寅 恪 热

以史家陈寅恪(1890—1969)为主题的讨论和话题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神州大陆和港台蔚为一股“陈寅恪热”^①。就近现代史学史乃至思想史发展而言,如何看待此一现象,以及如何为陈寅恪定位,皆属不可回避的课题。从正面看,“陈寅恪热”的出现,既有大环境变迁的外部因素,也反映出学术研究转向的具体关怀。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圈,自摆脱意识形态的教条和思维上的制式反应后,若能找出一位既能承接传统而又具备新学且能取法的对象,非仅是一种期待;最重要的或更在经历“文化大革命”的老一辈知识分子,已遭极左思潮和斗争摧残殆尽,人文社群缺乏一个可以共享并形成共识话语的典范,陈寅恪强调学术独立和自由思想,正符合了此一期待。

一个可以理解的视角是学者从意识形态领域转向后的抉择。虽然在政治改革方面未见根本性的调整,且不时因路线之争,上层权力结构出现向后转的倾向;但转向市场经济,则已从社会各个层面涌现

① “陈寅恪热”一词,在台湾初见宋德熹著《陈寅恪中古史学探研·绪论》。略谓:“随着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纪念的来临,大陆地区吹起一股‘陈寅恪热’的风潮,也迅速地扩及台港两地。”见氏著,《陈寅恪中古史学探研》(板桥:稻香出版社,1999 年),页 1。

巨大变化和动力,莫之能御;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或从事意识形态除魅,或通过学术批判重建学术伦理及规范,且社会所能供给的力道逐渐增强,人文学术和研究同步出现了上层理论替代和典型转移的需求,应是往下数十年大陆知识分子长期奋斗的目标。史学界寻求史家典型的重塑,正是此上层理论崩溃后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的一个显例。

陈寅恪长期和现实政治的疏离,以及坚持不接受意识形态以及理论先行的研究取向,对“文革”后崛起的知识分子自然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对照意义,这不仅是因为陈寅恪在史学领域里取得的成就,为近现代所罕有,更在陈寅恪的思想、人格和学者风范。以史家周一良(1913—2001)为例,在其生前最后一段岁月,不论写回忆文章或参加追念陈寅恪的学术聚会,由浅而深,一再公开作出反省,最后和盘托出当初批判老师的情况,以为请罪。^①这就是学术社群转型之际具有正面意义的具体写照,转型正义的自我实践。不仅是除魅和寻求典范,也更是传统正面价值观念的再确认和再肯定。

就当代史学史而言,身为史家的陈寅恪,自属不能忽视,且当给予高度重视,本书即系从此一大背景及思想面探索陈寅恪的内在思想的运作思维。由于典范匮乏,陈寅恪难免被形塑成高不可攀的巨大形象,

^① 案,周一良在1989年“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说:“来广州纪念陈先生,深感有负先生的厚望,心中无限惭愧。”《纪念陈寅恪先生》,《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页19。会后周一良访美,在纽约完稿的《我的〈我的前半生〉》说:“1942年陈先生撰《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在文章开端……颇富感情说:‘今则巨浸稽天,莫知所届。周君又远适北美,书邮阻隔,商榷无从,搦管和墨,不禁涕泪之泫然。’……我深受感动。蒋天枢(1903—1988)先生编陈先生全集,所收江东民族条释证文中,删去了此节。这当然不可能是蒋先生自作主张,定是本陈先生的意旨。……正是目我为‘曲学阿世’。”《周一良集》,卷5,页427。1999年11月27日更直接以《向陈先生请罪》为题,于“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的学术讨论会上作出“自我批判”,交代1958年对陈寅恪的批判。完全应受“破门之罚”的。周一良,《向陈先生请罪》,胡守为(1929~)编,《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页8—11。

这是一种放大和扭曲,有必要“以陈还陈”,面对“陈寅恪热”,这或许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应是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的一个基本的坚持。本书作此尝试,追索陈寅恪的思维运作,不过是其中一小步而已。

史家余英时(1930~)于20世纪末为陆键东(1960~)《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1995)一书出版后造成的全面性轰动说:“最近三四年来,中国大陆忽然掀起了一股‘陈寅恪热’。《吴宓与陈寅恪》[吴学昭(1929~)著,1992年]、《陈寅恪诗集》(陈流求(1929~)、陈美延(1937~)合编,1993年)都是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印行的。这两部书提供了不少新的数据。大陆学术界自1989年以来常有大、小规模的讨论会,探究陈寅恪的文化观念和史学成就。报纸杂志有关陈寅恪的文章更是不计其数。通过陈寅恪的研究,大陆学者似乎在认真地重新思考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世界的定位问题,其意义是深远而重大的。”^①三联书店版由陈寅恪女儿陈美延主编的《陈寅恪集》,其中最早推出,也是最难阅读的《柳如是别传》,初版一万册,甫出即再加印一万册,在非小说书类中实属罕见。再以汪荣祖(1940~)的《史家陈寅恪传》为例,2005年3月发行的北京大学出版社新版已售出一万册以上,这是另一例。^②

对“陈寅恪热”现象带有评述语气的罗志田(1952~),指称所谓“陈寅恪热”,怕“热”的实非其学术,而陈在民间拥有大名,多半像以前民间

① 余英时,《“后世相知或有缘”——从〈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谈起》,《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以下简称《诗文释证》,页279。案,以陈寅恪为名的学术讨论会或印行论文集至少出了五本,依序是:《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柳如是别传〉与国学研究:纪念陈寅恪教授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文集。

② 中正大学台湾人文研究中心网站《中心主任汪荣祖讲座教授简介》:“《史家陈寅恪传》一书曾在港台大陆出版五次,最近一次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已经售出一万册。”<http://www.ccu.edu.tw/tih/tih/index.htm>。

艺术中一个常见的人物钟馗,被他人借以打鬼而已。^① 这个“打鬼”的背景,应与知识分子期待学术的独立和自由的思想有关,甚至可以推演到对政治现实的不满。借着对陈寅恪的肯定,以浇胸中块垒。陈寅恪的学生,中山大学教授蔡鸿生(1933~)则认为此热来得有如“空穴来风”,来得不知不觉。反问陈寅恪真的有那么“多”“后世相知”吗?蔡鸿生引程千帆(1913—2000)《闲堂书简》致舒芜(1922—2009)函:“陈学热实体现对传统文化关注之心态,非徒重其学术创见也(多数人恐亦不懂他说些什么,但隐约感到他说的一定很重要而已)。”^② 就是这种隐约的感觉,让不少人对“陈寅恪热”带有更多好奇和想象。

就文化面分析,郭亚佩在其《历史的陈寅恪:“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与中国政治现代性》一文中认为,“陈寅恪热”可以分成两个版本:一是强调陈寅恪的文化怀抱,以及对传统文化的留恋,作为解释陈寅恪言行的中心主轴;另一个版本着重陈寅恪的思想理论,从陈的著作里,多方勾勒出陈寅恪对市民社会的活动能量的期待。前者将陈描述为“遗少”,而后者则将陈视为在中国情境下寻找自由民主种子的先驱。只是这两种版本都将陈寅恪抽离了他所处的历史当下。^③ 此时让“陈寅恪热”回归学术讨论,应是学术界的责任,也是本书的关怀。

因为“陈寅恪热”,相关史料及研究是否相对受到重视和提升,或是另一个问题。但有一个现象是:知识分子颇以认同陈寅恪相标榜,既刺激了史学及人文社会科学界对近现代以来史学研究重返学术规范的重视,也直接、间接帮助了史学观念、方法和思想的阐明。围绕

① 罗志田,《陈寅恪的文字意趣札记》,《中国文化》期22,页175。

② 蔡鸿生,《仰望陈寅恪》(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页2。

③ 郭亚佩,《历史的陈寅恪:“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与中国政治现代性》,《自由主义与人文传统:林毓生(1934~)先生七秩寿庆论文集》(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05年),页397—398。

着陈寅恪的研究和论述,也因此出现热效应。^① 而此,又与大陆近二十年来的“文化热”、“国学热”有一联动,互为影响,都可置诸改革开放重经济、轻文化的情境下观察。整个社会因各种压力仍在,出现非正常转型,“陈寅恪热”应可视为整个大环境逼出来的议题,唯此已逸出本书处理范畴。在陈寅恪成为“典范”的过程里,特别是中古以降的历史、文化研究,及具备现代或后现代意义的女性研究,不论史料的采择、考证以及方法的运用,或观点的呈现,都很难绕过陈寅恪生前处理过的论题。正如毛汉光(1937~)所言,“对于寅恪一生之学术成就,赞扬者极多,补充修正者亦不少,批判者亦有”^②。或是继承,或是发展,或是修正和攻错。最近几年相关陈寅恪的家世、留学情况以及从晚清以降的政治发展,甚至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在选题上都受“陈寅恪热”直接、间接的影响。这些现象非仅值得后学对陈寅恪有一学术上的好奇,探讨“陈寅恪热”的内在意涵,而非外在的热闹而已。

显 隐 之 间

陈寅恪既成为热效应的典范史家,相关研究、论述亦夥,其中又多集中于正面肯定其学术成就,或同情其遭遇,或持陈寅恪的相关论述,据以评论学术话题,或为月旦人物之资。似有但凭陈寅恪为准,

① 王学典(1956~)说,“国学热”当中的“陈寅恪热”有三点特别值得注意:首先应该看到在颂扬陈寅恪的现象中包含的意识形态内容,20世纪90年代走红的,更多的是意识形态化的陈寅恪;陈寅恪已成为90年代最大的政治与学术的双料“神话”。其次,也是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现象可能标志着学界从重思想到重学术、从重义理到重考据这一重要变迁进程的完成。高度尊崇陈寅恪,不单是对逝去先人的缅怀,而是“回到纯学术”,走陈寅恪治学之路。其三是陈寅恪热的出现,使得改写近百年学术史变成不可避免,变成“陈寅恪”取代“郭沫若(1892—1978)”。王学典,《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页259—260。

② 毛汉光,《陈寅恪传》,《国史拟传》(台北:“国史馆”,1995年),辑五,页157。

或以之为思考前提的倾向,在有意无意之间,疏忽了陈的思想发展背景以及和学术社群之间,或还有未经处理的互动和影响。显隐之间,过去相关陈寅恪的研究和选题,即多倾向就相关陈寅恪的文献探索,或就陈寅恪的学术成就正反面立论,而少有就陈寅恪的学思观点,特别是思维运作部分做深入研究者。

笔者在检读相关史料过程中,即发现陈寅恪引发的国文试卷应否以对对子入题的争议,其实与陈寅恪的学思观点大有关联,但过去皆着重其话题,而未探究其间如中文文法发展之于学术史的意义;再如陈寅恪的自我认同和成长背景,两者之间原有密切关联,过去亦未见深入钻研的论著,而此应属研究陈寅恪必要从事的基础工作。欲深度理解陈寅恪史学成就,且从思想发展及其运作者固夥,唯迄今未见以其“思维模式”为主题,探索其间是否存在内在关联的学者及论著。

陈寅恪何以会认同晚清以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命题,论者多矣,然多从陈寅恪和晚清思想或张之洞(1837—1909)之间究竟有何异同着眼;然而陈寅恪运用“体用论”的情况,以及如何处理“体用”之间的互动,则未之多见。陈寅恪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又何以会就韩愈(768—824)申论其于外来文化佛教的态度,论者或以为这是陈寅恪的“中国文化宣言”,但何以均疏忽陈寅恪提出的石破天惊之论,即“天竺为体,华夏为用”的命题,这不是明明和其过去所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恰恰相反吗?但陈寅恪不是一再强调“江东旧义雪盈头”,即至老不变者吗?至如陈寅恪留学海外多年,论其学术渊源者,多停留在陈寅恪的汉学或史学成就上,少有探索其思想渊源,特别是思维运作所借重者为何。

以陈寅恪最在意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言,此一命题和观念,固难求之于中土,然其思想渊源又当从何处追问,此亦为前贤

所忽略,但视其为理所当然,而未详其所以然。这又涉及另一个侧面,即学术论证所使用的方法和选择,本书即试图说明,并借由论证过程,以期尝试逼近陈寅恪何以坚持其基本价值观念之所由来,即若无思想自由又如何可能自如地运用“辩证法”。陈寅恪对于“辩证法”的运用,以及如何辩证地提出“假设”,亦为论述陈寅恪学术或思想者所未及。而这正是本书所欲从事且以为尚有可以论述及发展的空间。

思寻上述的疑问,既无现成令人满意的答案,自有必要通过爬梳其学术论证的路径,以期能推求其思维运作之所以然。黄萱(1910—2001)引陈寅恪的说法:“诗若不是有两个意思,便不是好诗。”而有:“他的诗自然是有两个意思的,所以难于通解。我相信将来必然会有史家用他的‘以诗证史’的方法,把他全部的诗,拿来与近代史相印证。”^①本书则是企图拿陈寅恪的学术论著以为其思维运作的印证。可以相信陈寅恪于其学术论证的路径和运用,非仅有其自信,且胸中另有丘壑,但期后人能为其“发皇心曲”。然则本书所注重者,不在为其古典和今典之间求其达诂,而在试探陈寅恪的“心法”^②,即其思维的运作,探究其“辩证法”和“体用论”的表述和论证。将看似不相干,把得之西学传统的“辩证法”和历史语言学,以及得自传统中学的“体用论”依序论述,且辅以少年认同的心理,探寻陈寅恪的学思发展。

本书期待能就此于陈寅恪有一新的观点,得一新的认识和视野;于史料的运用亦力求与陈寅恪的原意相符。本陈寅恪的“假设”和

① 黄萱,《怀念陈寅恪教授——在十四年工作时的点滴回忆》,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秘书组编,《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页71。

② 此处所用“心法”系取义于朱子(1130—1200)《中庸章句》卷首:“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后复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